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命运的张学良，日前以一百零一岁高龄辞世，迄今未见任何他对西安事变的直接评价。台湾联合报独家取得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口述历史纪录，他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国和世局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

在口述录音访谈中，张学良打开尘封了六＋几年的历史现场，他说，西安事变兵谏后，蒋委员长亲口向他说出：「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中国的历史，国共的命运从此改写，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攻守易势。 钻研张学良事迹的业馀史家郭冠英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一九九 0 年取得张学良同意，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几个关键所在，以及张学良和蒋公的互动，做了一次录音访问。并将录音稿整理后，交由本报发表。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接受访问，极具史料价值。对蒋公和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都有明白交代。

在访问中，张学良主动承认民国廿年九一八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责任不在中央，责任在他。

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另有一个口述史计画，但须在相关当事人去世后公开。本报取得的这份录音纪录，约一万馀字，更显弥足珍贵。

(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自己选择去剿共

郭：从国外回来（一九三四年欧游回国），您为什么愿意去打共产党呢？

张：当时老总统实在说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他跟我讲，他什么事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回来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样，你选择，出去以前，国内大家对你都不谅解，你选择愿意做哪样事情。有二个事情，一个是刘黑七，一个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你去打刘黑七。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到三省（豫鄂皖）。打土匪那是我不愿，后来就是这么样决定去剿共。我自己选的。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回来，我自己，良心话，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跟老总统当时都说明白了，老总统他不答应我。

郭：做侍从室主任？

张：不是这个，这个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不想带东北军，不干了。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就不带东北军，讲白，我想不带军队，不干了，是个包袱。所以，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到最后原因还是这个包袱，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备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是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这不讲理的事了吧？所以我这包袱就没法脱啦。所以我当时真是国难家仇，东北这包袱没法摆脱。

后来戴笠跟我讲句话，他说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话，东北军是你包袱？现在我们也

有包袱啦，也是一样的。我这部下我怎么办？所以人啊，你，你们没干过，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们中国，过去不是你当局长我作部下，明天还是冲著你来的，是这样来的。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

唐：By accident.

张：天下事就如此，没这准备，没预备啊。好像说，我不跟你说笑话吗，我跟文人不接触的，我说你是蛆虫。你（文人捧的人）不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我才不跟你们（文人），敬鬼神而远之。请你们三个人注意著，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样失败，失败成功不晓得……。

自评一生：失败

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失败。

郭：为什么？

张：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是我秘书长，其他全凭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

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我俩冲突就为这件事，没旁的冲突，一点没旁的冲突。

唐：我那时是小孩，听说张副司令批评蒋公是「按内让外」？

张：所以蒋先生的秘书汪日章说：我从来没见人敢跟他这样吵的。我跟蒋先生痛陈，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我说你这样下去，你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是无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这叫日本人这就一点点……，叫不能战而屈了兵，是胜之上者也。这是军事上说，不战就把我中国一点点吞了，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蒋先生大骂我一顿。(笑）我跟他这么样吵啊！嗯，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你怎敢这样呢？嗯，我我……蒋先生也很安慰我几句。还有蒋先生几句话，他现在不在了，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我真是……

郭：他说用机关枪打？

张：嗯。

郭：你说「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

张：是，我真火了。你怎么知道？

郭：你讲的，你跟我讲的。你说话到嘴巴里，没出来……

张：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九十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郭：您觉得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我认为他失败！失败！蒋先生这个人哪，我跟你们讲，我不愿意批评，蒋先生这个人很守旧的，太守旧的，顽固。而且蒋先生自己，这么讲吧，我给这么句话批评，就这一句话，假如他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我说就应该是对的。蒋先生是这么个派头，是这么个派头。说实在蒋先生对我是，我暗中想他也对我相当看得起。

郭：他尊敬你有话直说，但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

张：嗯，他是这个，我损害他尊严。不过我到了南京，我在西安也说过这句话。现在应该还有人记得这句话。我当时就说：「（西安事变对蒋）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

张学良口述历史 (中)西安事变擦亮蒋先生

唐：你把他擦一擦，他是更亮。

张：我这样做不叫他更亮吗？明白？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我说不客气的话，那是个泥菩萨，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扳倒了，我自然把这泥菩萨扶起来。他有灵，拿我脑袋疼，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不能不给他磕头。我对蒋先生，到南京我一样

是请罪，那他既然答应了，「你去吧（指放蒋）。」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他答应了。他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郭：这是他经过他太太转达的还是他亲自跟你讲的话？

张：当然！亲自！他跟我讲的。当时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我把这事情讲出来。我现在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我当时答应周恩来，周恩来说：如果你可以坐轿，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了这些事情。我们很希望，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儿太自骄了，我说我说服蒋先生，我说我可能把他给说服了。但是我没敢假设我负责任。如果你们条件是真的？真是这样，你说真的，我说好，你们真是这样，我跟蒋先生说说，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方面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著算。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得这么讲（呵……）。可是周恩来，我俩话说得很确实。他说你真能作得这样我们立刻……不过，他要我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仍让给我们，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待著；一个，不要把共产党给我们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馀，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并且我们当时定的这样计画，后来抗战时我跟蒋先生……，现在张秘书长（张群）说：「蒋先生那时怕你啊！拿你当个宝贝。这边拿著你，怕那边也拿著你，怕你跑到那边去。」那时候我们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抗日时这样摆著，我们绝对服从你指挥。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三个军队这么摆著，作战时这么摆著，我们绝对服从，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的……。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去？所以我就说，中央啊，事情也都过去了。（今天）我已九十岁，我也不怕了，中央糊涂，他就一直不晓得我与共产党有联络。后来戴先生（戴笠）我俩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的特务。你特务什么了？你特务！

再说为什么各方后来都要蒋先生下野？阎锡山对我秘书说，他蒋先生不走，你事情没有办法改革。蒋先生真是如马歇尔对顾维钧说的（握拳状），什么意思呢？拿著权不放。蒋先生就是这个作法。你（指唐德刚）那「李宗仁传（回忆录）」中李宗仁说得一点不错，你不干了，你还在干什么呢？不但干涉，你还照样下命令。你照样下命令，人家怎么干呢？你到底是干哪还是不干？所以这是蒋先生的错误，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嘛！张文白（治中）说的一点不错，他们都刺透他这个人了。

唐：所以汉公说蒋公是有大略没有雄才，是不是？

张：这是我批评他，我说蒋先生跟我父亲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没雄才。张啸林、杜月笙知道吧？当然，他们是帮会的人哪。他们就说蒋先生不会做。他说你到南京蒋先生就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情，但是蒋先生就没这个雄才，张啸林如此说。

郭：他为什么不放你，你觉得呢？

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是张岳军（张群）告诉我为什么。张岳军说：「你是个宝啊，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他意思就是说怕你被共产党抓去（争取去）。

郭：不放你，可能是怕你讲出来？

张：那没什么，我讲什么？我绝不会讲。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绝不讲。

郭：您对钱大钧的看法怎样？有人说如果钱大钧继续作你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因为您与他处得比较好，您不喜后来的晏道刚？

张：不是，晏道刚也不是喜不喜欢，钱大钧也不是喜不喜欢。简单的说，我那参谋长就是蒋先生派的一个间谍坐在那里。晏道刚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钱大钧比他油条。所以蒋先生对晏道刚很气，他并没有注意这些事情（指张联共），他不太理和（指不进入状况），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没那么注意。

给蒋一个下台阶

张：我当他爸爸（王新衡）面说，他们特务就做那么些事，胡扯蛋，正经事不做，光做胡扯瞎扯的事。他（唐）的岳父（吴开先）也是 CC 大将之一，CC 更糟糕。后来他们那些玩意我都看见。

郭：抄省党部那次？（八月二十九日张因秘书被陕西省党部捕去，怒而派兵抄了省党部，当时本欲与蒋提前决裂。）

张：都看见，胡说八道嘛，根本没那事报告那些事，是什么玩意呢？花那个钱真冤枉透了。所以那时中央吃这个亏吃大了，所以各省都对此没有好感。没好感的原因就是他们在里面搞的，中央就信那套。我这个人用人就不同，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我要是疑惑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交给你，我现在也这样做事。所以人哪，我今天还是基督徒，人啊，祸背而出，倚背而入。你怎么待人，人家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得一点也不错，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你用这法子待人，开始人家不知道，慢慢人家知道了。你（指郭）还年轻，记著我的话，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这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问心无愧，我对你没什么。我说我这个人，待朋友，待部下，待什么都是如此。

郭：罗启（蒋经国副官，六 0 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熟。）说有天中秋您喝了点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的日记。」有没有这事？

张：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下台阶。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 CC 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郭：在贵州得盲肠炎（一九四一年），听说他们（特务）要把您杀掉？

张：有说戴笠就要把我弄死。

郭：可是您在西安事变对戴笠不错啊？

张：戴笠也不能算错，在那时就把这事完了，解决了，死了就死了，没有了，省去这个麻烦了。我也不认为就是戴笠。

郭：您对汪精卫、胡汉民看法怎样？

张：汪精卫虽与我有冲突，但这个人的学问我还是佩服的。胡汉民在我游欧回来时曾劝我不要去南京，他说叫我去广东、广西玩玩，意思是（争取我），我说我已跟蒋先生约好了，回去南京看看再说。他就骂汪精卫说，他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我们二个人，一个汪一个他。总理派汪精卫到外面办外交，办这些事，办那些事，都得说假话，不能说真话，汪精卫习惯了，跟谁都说假话。我在总理面前甚么话都敢讲，甚么话都说，总理也原谅我，我什么都说，我也说惯了，专门说实话，再说，惹祸啦，惹出祸来。嘿嘿嘿，他意思就骂蒋先生，哈……很有意思这句话。

唐：怎是骂蒋先生呢？

张：他说他对总理说实话，总理也不生气，好听不好听都不管，我说惯啦，再说（蒋当权后）就说出祸来了，嘿嘿……哈哈，很有意思。（指胡被蒋扣在南京汤山。）

郭：您与蒋夫人关系如何？

张：一九三 0 年底我到南京，蒋请我喝茶。蒋夫人一看我说：「汉卿你好！」蒋先生奇怪，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还在认识你前哩！」（唐：哈哈！）我第一次到上海（一九二五年，五三惨案。）人家请客，有宋美龄。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孙中山的小姨子，旁的都不知道，故蒋说：「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哈哈！

郭：西安事变放蒋是不是给蒋夫人个圣诞礼物？蒋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张：唔唔唔（嘴中有饭），蒋夫人毫无影响。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年这事开始时，我们就没说要把蒋先生怎么样。因此后来我与杨虎城俩几乎闹翻了，就是为这个事情。杨虎城怕了。我说：「咱们当年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反对内战，你是不是又惹起内战？你不是扩大内战吗？你为什么自己做的事与自己心里的愿违呢？你既然要怕，你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你不用怕，我去负责任就行了。」我去南京时，我真决心去死啊！那南京可以把我枪毙啦。我自个儿说：「我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毙了。」

郭：老先生对你还不错啊！

张：那是，不是他死后我写副对联吗？「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重新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还是关心。这里我还要说，那后来经国先生对我更好了，对我好得很，对我很关切。不过当然啦，政治上问题是政治，私人感情是私人，我那天不是讲，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就像九一八那不是政府，那是我的责任，我这个人是这样。

郭：如果您这一生重新活过？

张：什么？重新来过？我九＋岁还重新来什么？明年也许完蛋了。 我有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张岳军总骂我那两句。我就是虚名害了我一生，我不是谦虚，我自认失败，一事无成两鬓斑。

虚名害了我一生

唐：汉公，在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是成功啦，成功，是不能看短期的。

张：我给自己下了个考语，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啦！

郭：汉公，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向您这老头子致敬哪！

张：怎么地？你要拜我做老头子？我又不是「青红帮」。(对唐指郭）他说拜我做老头子，我说我又不是青红帮（张开玩笑，因老头子在青红帮是老大的意思。）有一首诗我倒想告诉你，我在谒延平郡王祠时有这首诗：

「孽子孤臣一(禾犀)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看出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

郭：您是在讲蒋先生？

张：在讲我自己啊！讲东北啊！

假使我不这样子的话，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就是土肥原顾问的「王道论」中说明了，意思是不要我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捧我帮我。我为这事跟他火了，我以后就不见他，日本没法只好把他换了。

我父亲死后日本派元老林权助来吊丧，事后我请他吃饭，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来这里，我没得你一句话，我回去无法交代啊，意思是不要我挂青天白日旗。我说你忘掉我是中国人啊！我这是喝了酒有点失言（意思太不给林面子)，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我去送行时他的随员还想跟我讲，他制止他们，我也知道东北危矣。

郭：有人说其实您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情况会较好，对您也较好？

张：那当皇帝？

郭：这可能对东北比较好啊？没九一八，东北能保持现状？（郭在激张)。

张：为什么我要服从？我就变成日本傀儡了？！

郭：可是您有实力啊！东北很大啊！

张：东北是大啊，但你不知道，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要怎么就怎办！你这问题问得根本不懂情理，我为什么责备你不懂情理？我父亲怎么死的？我先问你，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

就是不做日傀儡

郭：就是他不合作嘛！

张：他就不给他当傀儡，明白这话？你要做，就得当日本傀儡。日本是对你好吗？他要侵吞你啊！我后来跟日本朋友说笑话，我说你日本人不能叫人跟你合作，就像我有老婆偷你人，你别作声，咱们也就算了，你呢？你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老婆跟我睡觉，你日本人就干这种事。你跟他当那傀儡还得像一个傀儡样儿啊！所以你说我责备你，给日本当傀儡也不好当啊！

郭：可是有人说大帅（张作霖）如果在的话，大帅不会跟中央合作啊？（即大公报评张说：「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著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渖阳之变起矣。」）

张：那不一定，那就不知道，这句话也有道理。所以我说日本人混蛋，我父亲愿意合作都被杀，那何况我呢？也许那时我父亲比我容易操纵，他们都不容，他们没想到我更难搞。我今天九十了，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说这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样子讨厌。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就连杨宇霆（后被张杀）也没想到，他也想操纵我，换句话说，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就连蒋先生想操纵我，我也不受操纵的。我要受操纵还有今天？我有自己主意，我有自己见解，那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个样。我那时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一件事，他是行政院长，同宋子文到北京来看我，拿了蒋先生一封信，他的主意要我们与日本打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我说汪先生您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你那么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有信是让你跟我商量，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他一怒回去就为此事辞职了。

反内战反对透了

以前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所以我说阎百川

（阎锡山），他那时就没想到我。我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我有这个意思，你不听，我打你，中央要是不听，我就带你打中央。你明白我意思？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

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我父亲后来不打（出关）也是我。我给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因前面有红枪会，我火车停在那。我看到这事情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在车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扔给她，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我就问她，你没子弟吗？没儿女？她说都给抓当兵去了，拉去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自个儿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后天又不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备的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我父亲看我激动，教我不要打，休息几天，我痛哭反对啊！

唐：你在河南作战后是否留了封信给北伐军？

张：那封信我是留在陇海铁路司令部给前线的北伐军，好像是白崇禧。信很长，我还记得，我告诉几件事：

第一，我剩下粮草我可以放火烧的，但用来赈济老百姓我不烧。

第二，我说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上来，我把它毁了你们一时修不来，我没炸因为这是国家的桥梁，我没毁。

第三、……（忘了）

郭：您是否有说大家乾脆不要用军队打，有种拿手枪比比算了？

张：他们不敢的，嘿（笑）！这是为什么呢？真有目的还可以，打来打去，我真是厌恶，我一直厌烦这些，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我不愿意剿。有什么意思呢？

唐：自己打自己。

张：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我跟你说个小故事，张发奎你晓得？我跟他在河南打得非常惨烈，他号称『铁军』，双方死了好多人，到后来在英国，大使郭泰祺说要给我做介绍，我说我们早认识啦，不打不相识呢。后来我们很熟，还在红宝石酒楼一起吃饭。

郭：谈谈您四弟张学思，他是不是在溪口书房中与您笔谈？

张：是这样的，那时我四面都有人（监视），我们也没谈什么正经事。他写说他是共产党，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书，那不是正经书（意思是要看马列）。那时候他很厉害的，他说他在军校就是共产党，国民党怎能不败呢？内部好多人都投了共产党。他本来毕业的时候我推荐他去胡宗南那边，他没去，就跑到东北军去了，在东北军中鼓动得很厉害。东北军后来投去共产党那边很多，最厉害的就是吕正操。

郭：东北后来掉到共产党手中，有人说中央不放你回去，张学思去鼓动等都是因素？

张：嗯嗯，后来文革时共产党四人帮说他是东北帮首领。把他整死了。

郭：周恩来对张学思之死一直很难过痛心？

张：兄弟中我最喜欢这个弟弟。我从前跟你说过这话，我宁给好汉牵马蹬，我不给赖汉当祖宗，你懂这话？我这弟弟有骨头，我那二弟(学铭)我就骂他色大胆小。我这弟弟最有骨头。

郭：来到台湾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老先生？

张：我说不出来，（他）在大溪住的时候。

郭：他找你去的？

张：他不找我去我怎么能去？

郭：他对你讲了什么？

张：我不告诉你。

后来见过两次，大部分都是经国先生与我见面。我与经国先生很好的，我们是无话不说。

郭：那封「忏悔录」是怎样呢？

张：那是老总统要写「苏俄在中国」，他怕写错了，就叫我把西安事变写下来。他说：「我这方面的事很清楚，但他们（共）那边的事我不清楚，你可把它写下来。」我说：「西安事变我本是至死不言的，你今鞠诚问我，我就鞠诚对答。」后来写了，不知是谁，大概是王升都不一定，反正是经国把那信改了，信头改了，把它掐掉了，要我拿回来，我重新给他写过的。这稿子我还留著，他拿回去就发表给将领看。后来这事出了很多波折。我看到了说，如果你写「张学良忏悔录」，我不能说什么，但他写了「忏悔录」，不署名张学良，好像这东西是我自己发表出去的。我就给蒋先生写封信，并不是说我反对，而是说蒋先生可别误会是我发表。蒋先生火了，所以把办事的撤掉，东西也收回来，就这么回事。

蒋当然已原谅我

按：忏悔录应在民国四＋四年所写，当时经国先生尚未奉命与张学良多联系。老总统看了最出意外的是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张要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张个人的决定。第一次写的，蒋非常不悦，对著监管张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大骂张学良说：「他还不悔过，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他知道不？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刘乙光儿子刘伯涵转述）稿子也退回改写了，是赵四小姐抄的。

张：我因为写那篇文章，蒋先生很奇怪，因为他确实知道没人帮我忙。他说你怎么会写这么好的文章，他后来叫人来告诉我，你就写文章吧！我本来写了一点后来就不写，后来他也不过问，我说过，高兴写不高兴写没有心。

唐：您觉得蒋先生原谅您吗？

张：当然是，不原谅？他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不在乎，真是不在乎。我就是今天还是敢说这句话，当著你们三个人：假如国家要用到我，虽然我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事我不干，假使那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干。

张学良生前谈「西安事变」
李勇

半个世纪来，争议不断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十月十四日晚上八时五十分在檀香山逝世，享寿一百零一岁。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均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简述十年前笔者与他所作三个小时倾谈的经过：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下午，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带了几位东北同乡到曼哈顿中城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所有的公寓去拜见他们景仰的乡长张学良叙乡情，在东北老乡的心目中，张学良不仅是乡长，也是重要历史人物。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举世瞩目、影响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西安事变」。

与张学良见面的东北老乡中最受注意的应该是刚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两位中国名记者刘宾雁、曹长青，另外还有纽约当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我因与徐松林会长交情不错，虽非东北人，也获邀陪同刘宾雁、曹长青去谒见张学良。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当然希望有机会见见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听听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因为过去半个世纪来，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这个人有太多的揣测之词，当然也有不少谣言与流言，假如在谒见他时听他亲自解说，这岂不就是历史学家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口述历史」？

当我们按约定时间抵达张学良临时寓所，他的夫人——赵四小姐不在，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餐厅圆桌一隅，经过简短介绍，张学良逐一与到访者握手，然后大家围圆桌坐下。张学良一开始就问每一个人的家乡地名，当问我的时候，我正想说我是广东人，徐松林会长看了我一眼，深怕我说出新闻记者的身份影响张学良叙乡情的兴趣，于是我随便说了一个地名——「黑龙江」。

我之所以说黑龙江，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定期汇钱寄粮包去黑龙江宝清县一个农场，给在那里接受劳改的妹妹，因此对黑龙江这个地方十分熟悉。张学良听我说了地名，颇有疑虑，再追问：「黑龙江什么地方？」我立即很自然地说出宝清县，然后加上一句：「那是北大荒，靠近中苏边界」，这时张学良才释去疑虑。后来猜想可能我的口音露出破绽。

张学良那年是九十岁，但毫无老态，他耳聪目明，反映灵敏，一开始他就说耳朵不太好，请大家说话大声一点，后来我发现，当大家所说的话题不敏感，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果话题敏感他不想回答，就说听不清楚，请提问者再说一次，或者顾左而言他。

刘宾雁坐在张学良的左侧，曹长青坐在张学良的右侧，徐松林会长一开始就问张学良：「有没有回去家乡看看的念头？」

张学良说，他非常想念家乡，而家乡的人也不止一次出来劝他回去，但是此刻他不会回去，因为牵扯的关系太多不方便。

刘宾雁与曹长青两人立即说：「那些来劝你回去的人都是中共派来统战你的，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统战回去，那就中了中共的诡计。」

张学良回应刘、曹两人的劝告说：「我不会回去，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想被政治左右，更不想被别人利用。」

张学良承认，中共方面派过不少人来看他，并劝他回去看看，他知道中共的目的，由于他对「政争」没有兴趣，所以避免被人利用。

刘宾雁说：从前他在中国大陆做记者，的确很希望张学良回去，但现在他改变想法，不希望张学良被中共利用。张学良立即表示，他完全同意刘宾雁的说法。

谈到中共统战，我立即追问张学良：「假如时光倒流，你已知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几十年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的浩劫灾难，你是不是还会反对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去发动‘西安事变’，强迫老蒋与中共合作抗日？」

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不能同意蒋先生当时‘安内攘外’政策！」

我再问：「为什么？」

「很简单，」张学良说：「那时候的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被杀，中共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逃亡（中共称长征）仍然保持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中共军，既不能消灭他，就只有跟他合作一同抗日！」我对张的回答反感，疾言厉声说：「你难道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导致中共坐大，打下江山，使中国人被整死逾亿，锦绣河山变得一片落后破败，这种祸患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不同意把日本鬼子与中共政权比，他们的做法不相同。」

「怎么不同？」我说：「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政治斗争不绝，残民运动不断，中国人如非死于人祸就是死于天灾，六O年代的大饥荒，三年就饿死四千五百万人，这种浩劫灾难，你难道不知道？」

张学良很注意听我的话，但却轻描淡写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过，家乡来的人也曾经告诉我。」

我告诉张学良：「假如你留在中国大陆不去台湾，很可能在文革浩劫中丧生！」

张学良说：「那不一定！」

我说：「你的弟弟张学思不就是在文革浩劫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件事你知不知道？有

没有人告诉你？」

张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与他的好友吕正操在一起，后来吕正操来美国与我见面，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张学思自己不好！」

张学良的谈话避免对中共在政治上的表现批评，他动不动就说他不谈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甚至他弟弟惨死他也只归罪于红卫兵，他不指责毛，相反吹捧周恩来，形容他是「大政治家」，是「大功臣」、「能屈能伸」、「说话简洁」、「反应快速」，是他最难忘的「老朋友」，因此周死后，他一直与周的「爱人」邓颖超保持联络，互相通信。

经常以「大丈夫」自许方张学良，当谈到中共政权在大陆种种倒行逆施，他如非沉默无言就是婉转辩解，被追问太紧，他立即以「不谈政治」回应，既闪烁又忌讳，毫无大丈夫敢言的气概。

笔者向他说到中共在大陆上展开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并把自己家人亲友遭遇作佐证，但张学良一律不予置评，也不搭腔。

当时我告诉张学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共从夺权成功统治大陆的一九四九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死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的中国人有五千七百万人，加上后来的六 O 年代大饥荒、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逾亿中国人非正常死在中共的苛政下。」

张学良沉思片刻说：「一个新政权建立总要杀一些人的，这没有什么奇怪！」

我说：「在夺权战争中有人牺牲，那不奇怪，问题是中共已有效统治中国大陆四十多年，为什么还关起门来杀害自己同胞，别的不说，仅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见，不知张先生有没有看电视？知不知道此事？」

张学良回答说，他没有看电视，只知道有此消息，但详情不太清楚！于是在座诸人纷纷向他描述六四屠城经过。张学良认真听讲，但不置一词。

我有点气愤问张学良：做人应有良知，应掌握大是大非的分寸，请张先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才算正确？

张学良冷静地说：你只要做好自己份内事就可以，不必理会别人做什么事，不惹麻烦就可以。

「那么中共滥杀中国人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我问：「一九四九年底，广州沦共，中共立即逮捕了六位香港派驻广州的记者，经游街示众后枪毙。先父也是新闻记者，如果不是及时逃去香港，也可能被杀，因为中共发出通缉我父亲的布告中，把我父亲形容为反动文人。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留在大陆应该怎么做？忍辱挨整还是挺身反抗？」

张学良对我的愤怒追问冷静以对，他又说：「你只要在自己位置上，自己岗位上把份内事

做好就够了，管别人干什么？」

我对张学良的答覆很不满意，本想再加重语气追问，坐在我旁边的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立即以脚碰我向我示意，并以其他问题岔开这个话题，而这时陪同张学良住在寓所内的老部属宁承恩从后面房间出来，对我怒目而视，似乎怨责我不应用那种口气来质问张学良。

我不知道宁承恩是何许人，后来从徐松林口中知道，他一九二四年廿三岁那年得到张学良资助，去英国的牛津大学经济系深造，二八年学成回东北在张家的边业银行做事，后到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任秘书长，受张学良知遇重用，因此一生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对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半个世纪不满，经常发表挞伐蒋介石的文章（笔者按：宁承恩已于二 OOO 年二月十五日在美国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又十一个月）。

张学良虽避免谈「西安事变」，但却有问必答说出他对「西安事变」的悔意，他形容那是他对蒋介石的「背叛」，自称「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在回答问题中，澄清了来自中共及其同路人所制造的谣言及谰言。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未能全力抗击导致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但中共所拍的「西安事变」电视剧则说张学良是奉了蒋介石之命不抵抗，从此以后，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史学家则据此丑化蒋介石，并窜改抗日战史，编造蒋介石不抗日，抗日战争是中共打的，日本投降蒋介石则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当大陆记者曹长青以此问张学良时，张学良说：「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

中共宣传机器与海外亲共历史学者，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蒋联共抗日的表现加以表扬，形容他是「民族英雄」，然后借此攻击蒋幽禁张学良几十年，夸大张学良对蒋介石之不满。张学良对此也有相反的说法，他并不感激中共推崇他是「世纪大功臣」，更不同意中共及其同路人对蒋的丑化。

张学良说：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世纪功臣」或是「千古罪人」，当年我要送蒋介石回南京，蒋周围的人要杀我，是蒋一直保护我。

我问张：假如他不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中共会不会把他当作张学思杀掉？会不会活到九十岁？张学良不想回答，但见大家望著他等候他答覆，只好硬著头皮说：「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想不至于被整死吧！」

张学良显然不同意中共与同路人对蒋介石的丑化，也不同意他们歪曲蒋介石与他之间的关系，他对被蒋幽禁几十年也没有怨恨。他说：蒋先生与他情同骨肉，一向对他呵护备至，所以蒋去世时，他送的挽帐写著：「关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见相争，宛如仇雠」。

张学良说：失去自由四十年是他应该接受的惩罚，没用什么好怨，当时他陪蒋去南京，是抱著必死的决心。「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张学良！」

说到枪毙，张学良对与他一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被杀表示痛惜，他说：「那是我一

生最痛苦、难过的回忆。」

张学良说：「我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张作霖，一个是蒋介石先生，但他们两个不同。我父亲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无雄才，如果他们携手合作，中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最使我难以接受的是张学良对中共政权的老狐狸周恩来的推崇。。

我向张学良说：「毛共发动的两个残民运动—反右与文革，周是帮凶角色，一般人评价，毛是真小人，周恩来是伪君子，这种人不配称为大政治家。」

张对我的说法不置可否，也不正面回应，只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张学良自知发动「西安事变」是闯祸，是做错事，他说，那是东北人鲁莽、捅漏子的性格所引起。不过，他也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这大概是张学良闯祸、捅漏子后，还坚持认为，蒋介石当年的「安内攘外」是不对的理由！

经过三小时的倾谈，张学良的谈兴正浓，估计再说下去「西安事变」的真相可能脱口说出，不料此时门铃响起，宁承恩离座开门，谈话停止，大家注目外望，只见联合报大老板王惕吾的次女王友兰女士为张学良送炖汤来，并奉他父亲之命向张伯伯问好。这时大家才觉察到疲累，结束谈话后起来拍照留念，然后辞别下楼告别这位争议不止的历史老人。（按：王惕吾与王友兰父女均于年前去世）